

第二章

北平輔大求學



一九三九年，王光美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平輔仁大學。在這裡，她度過了她人生中最美好的七年時光，不僅掌握了專業知識，還經歷了許多難忘的事件。



大學校花

在北京後海不遠的定阜街有一幢中西合璧的二層建築，灰磚青瓦，掩映在松柏綠蔭之中，那就是北京輔仁大學舊址（現為北京師範大學成人教育部）。中外遊客經過此地時，導遊總會介紹說：「王光美在這裡讀過書……」

輔仁大學是一九二五年由天主教會在中國創辦的私立學校，校名取自《論語》中「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詞句，意思是借著朋友的幫助，增進仁德。一九二六年，著名國學大師陳垣先生擔任校長後，學校教學實力逐步增強，規模也越來越大，成為一所文、理科綜合性大學，盛極一時，為社會培育了不少精英人才。新中國成立後，北京輔仁大學由政府接辦，一九五二年與北京師範大學合併，原校名取消。上世紀六〇年代初，輔仁大學在臺北復校。

一九三七年北平淪陷後，輔仁大學因為特殊的國際背景，日軍佔領當局未能入校，教學得以繼續。許多家在北平、沒有逃亡到內地的學生都考入了該校。王光美一九三九年九月考入北平輔仁大學數理系物理組，那一年的物理組僅四名女生。

進入輔仁大學那年，王光美十八歲，已經出落成一個身材高挑、皮膚白皙的美女。在同學們眼裡，她不僅長得漂亮，而且性格活潑，為人熱情、大方。因為是教會學校，輔仁大學有一些清規戒律，有些課程還是修女任教。因此大多數女生跟男同學接觸顯得很拘謹，但王光美在這方面比較大方，與研究生、助教這些人也有來往。

王定一先生和王光美不僅是同學，而且還是天津老鄉，雙方父輩關係一直很好。「成為校友後，我們幾個世交子弟經常結伴回天津或遊覽北京的名勝古蹟。」雖然他比王光美大幾個月，但在日常交往中，總是王光美更多地照顧他：「每次結伴郊遊，

光美帶的食品總是最多的。一到就餐時，她就把自己的食品拿出來和大家分享。」

當年曾同在物理組讀書、當助教的師兄佟盛勳先生對師妹王光美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回憶說：「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六年，我一直跟她有很多來往。那時候，我們一起去動物園和玉淵潭玩，可惜那些老照片都沒有了。有一次，我生病了，一個人在宿舍休息。她怕我悶，就跑來陪我下棋，還贏了我一盤。」

佟先生還記得，王光美讀研究生的時候，燕京大學的一個男研究生經常過來幫她搜集資料，做研究。燕京大學歷來有男生幫女生幹活的傳統，輔仁大學則沒有。也許正因為輔仁大學講究一點男女界線，王光美經常和男生交往的行為就顯得有些突出。她的小師妹惲瑛女士回憶說：「我是一九四三年進入輔仁大學的，記得第一次在系裡的走廊上看到她，同學就告訴我，她就是王光美，挺活躍的。」

漂亮和活躍使王光美獲得「校花」的美稱。但王光美本人對「校花」這一稱號極為謙虛。她晚年在一次接受媒體採訪時笑呵呵地說：「我從不知道我是校花。我倒是聽說化學系一個叫范繁的女生被稱為校花。她是化學系的，會說法語，他父親是大學校長，她面部輪廓很符合審美的標準，在社交圈子也很活躍。」事實上，王光美在讀大學期間穿著樸素，常常是一身簡樸而又乾淨的學生服。夏天，因為天天騎車上學，她的胳膊還常常被太陽曬脫了皮。

王定一先生回憶說：「所謂校花，只是大家私下裡稱呼，她可能真不知道。」



愛國學生

在日軍侵佔期間，輔仁大學雖然因為特殊的國際背景得以維持正常教學，但也並非世外桃源。因為害怕師生宣傳抗戰，日本憲兵隊派遣特務經常喬裝成學生潛入校園，監視師生們的一舉一動。有一天，一架中國飛機從北平上空飛過，同在一個大學念書、比王光美高兩屆、在化學系讀書的王光英興奮地大喊：「看，咱們中國的飛機！」結果被日本暗探發現，關進了日本憲兵隊。後來，父親王治昌托人求情，才將他保釋出獄。

輔仁大學學生愛國是有傳統的。一九三五年，在由中共北平地下組織發動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一二九運動」中，輔仁大學的學生衝破軍警封鎖，參加了示威遊行，並有學生英勇犧牲。中共地下黨員「一二九運動」領導人之一彭濤就是輔仁大學學生。當時王光美還在讀中學，雖然沒有參加示威遊行，但耳濡目染之中，學生們的行動也促動和激發了她的一腔愛國熱情。

日軍侵佔北平後，輔仁大學部分師生在校長陳垣先生支持下，秘密成立一個抗日地下組織，向學生灌輸愛國思想，王光美經常和同學們一起聆聽講演，聲討日本侵略者。和許多同學不一樣的是，她不僅痛恨日本侵略軍，而且不懼怕他們的淫威。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一天，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消息傳到國內後，日本憲兵隊怕學生鬧事，派兵將學校圍住，將學生攆到操場上訓話。王光美毅然坐在教室裡沒動，以自己的行動抗議日軍的蠻橫。

據王定一先生回憶，王光美還援助過愛國校友。有一年，輔仁大學一對姐妹同學參加抗日活動，被日本憲兵隊發現後，羈押入獄。王光美知道後，挺身而出，四處奔波，最後終於將這對姐妹營救出來。



居里夫人夢

王光美本科讀的是光學專業，其中有幾門課程由外籍教師任教，說的都是英語。考入輔仁大學後，她在英文學習上下了不少功夫。有一段時間，她還特意找了一個住在北平的美國老太太，假期或週末上門請教、練習口語。到大學畢業的時候，她不僅能聽、能寫，還能說上一口流利的英語了。

在大學期間，王光美學習比中學階段更加刻苦，每天騎自行車上學，晚上經常學到深夜。為了能安心學習，她要母親把家裡原來的一個過堂封起來，做成了一個小房間，然後搬出妹妹們的那個房間，每天晚上在裡面睡覺、看書、做作業。

據北京輔仁大學校史資料記載，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二日，輔仁大學公佈的學業優良的學生名單上，王光美名列榜首，平均成績高達八十九點二分，這一成績不但在女生中獨佔鰲頭，而且同屆男生也很少有人能及。佟先生回憶說：「說王光美是物理學部幾個女生中最聰明的，這沒什麼問題。」

一九四三年七月，王光美大學畢業，她到晚年還記得當年她寫的畢業論文題目《利用光學測量距離》。內容雖然並不十分深奧，但嚴密的論證過程和嚴謹的科學精神，贏得了老師們的一致好評。

本科畢業後，王光美接著攻讀碩士研究生，同時留校擔任助教，有了一份不多的薪水。因為輔仁大學有規定，研究生當助教，薪水只有專職助教的一半。王光美每次領到工資，都要如數交給母親，自己不留一分錢。她晚年回憶說：「我這個人有個怪脾氣，就是不願意領錢、摸錢。通知我去領薪水，還真不好意思，也不問多少，給了就走。」她不願意摸錢的習慣一直保持到老。

王光美在讀碩士研究生期間，研究的課題是宇宙放射線。這是一門艱深的專業，對一個女生來說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當時輔仁大學碩士研究生並不多，女生就更少，導師上課時常常只有她一個人，但她每堂課都沒翹課過，一個人鑽研得非常認真，而且樂在其中。在研究宇宙射線過程中，她還對原子物理學產生了深厚興趣，抗戰已經露出了勝利曙光，她暗暗用功，打算拿到碩士學位後，再去美國深造，攻讀原子物理博士。

王光美的童年和少年是在軍閥混戰、國民黨腐敗統治以及國土淪喪時期度過的。在國家衰敗、人民貧困的現狀的刺激下，她漸漸接受了「科學救國」的思想，並萌發了「居里夫人夢」——做一個對祖國、對人類有偉大貢獻的科學家。

一九四五年七月，王光美順利通過論文答辯，獲得碩士學位，並繼續留校擔任助教。這期間，她輔導了一個名叫鄧昌黎的物理研究所本科生。這位學生後來成為了享譽世界的高能物理學家，曾擔任美國阿岡（Argonne）國家實驗室粒子加速器主任和費米研究室核心人物，上世紀八十年代曾回國參加中國第一個原子加速器的建設。

六十多年後，鄧昌黎先生對王光美老師當年的音容笑貌仍記憶猶新：「她是一位親切、樂於助人的老師。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我在輔仁大學物理研究所讀書，她很樂於幫助我們解答當學生時遇見的課業難題，她知識豐富並且很有能力來幫助我們解決問題。」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人在投降書上簽字，八年抗戰終於獲得勝利。人們歡欣鼓舞，似乎看到了民族復興的曙光。王光美和物理系的幾個助教自己籌錢創辦了一份綜合性雜誌《青年之友》，向民眾介紹新科技、新思想。她本人積極撰稿，翻譯了

一些美國雜誌上的文章，其中一篇叫《雷達》，很受讀者喜愛，後來因為紙張漲價，雜誌辦了三期就停刊了。

王光美的才學深得系主任歐斯特教授和導師嚴池教授的賞識。嚴池教授特意為她寫了幾封去美國留學的推薦信。第二年，她果然收到了美國斯坦福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並且承諾提供全額獎學金，資助她完成原子物理博士研究生學業。

但是一年之後的王光美並沒有按她原來的打算去美國，她選擇了另一條人生道路；去延安。告別輔仁大學那天，她沒敢去向導師辭行，「當時，我不知道怎麼對老師說……」她晚年回憶說。

據王光美的女兒劉亭亭回憶，「文革」後，有幾位華人物理學家來拜訪她母親，曾對她說：「你媽媽最應該成為新中國第一代物理學家，而且是非常傑出的物理學家。」

對王光美棄美國而投延安的人生選擇，鄧昌黎教授有過非常理性的評說。二〇〇六年十月，他在接受《新世紀》雜誌採訪時說：「物理學是一個困難的領域。我不確定若她追隨物理事業是否她已經取得很大貢獻，無論怎樣，在中國一九四九年的政治社會空氣下，我認為她追隨中共的政治事業是明智的。當然，那時沒有人可以預見後期的悲劇，無論怎樣，她在出獄後仍擁有幾年光輝充實的生活，我覺得總的來說她對她的整个人生是做了一個好的選擇，王光美女士有著非常充實和豐富的人生，同時她也為新中國做出了貢獻。她生活的一些部分或許是不幸的，也許有些人覺得是悲劇，但總的來說她是成功的。她的親人朋友應當為她而感到驕傲。」



母校情結

王光美在輔仁大學度過了她人生中最美好的七年時光，不僅掌握了專業學識，還經歷了許多難忘的事件，從一個十八歲的單純女孩成長為思想進步的青年。她對母校的感情終生沒有變淡。

一九八四年，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成立，在校友們的推舉下，王光美欣然擔任會長。此後，她一直充當著聯絡、凝聚校友感情的橋樑。和王光美同屆或相近的校友不是在海外，就是大多已經步入耄耋或古稀之年，王光美當選會長後，他們都陸續回到北京相聚。

王定一先生就是在一九八五年校友聚會上見到三十多年未曾謀面的王光美：「光美第一眼看到我，就關切地問：你怎麼變得這麼老了？在得知老同學們的近況後，她向因她受到牽連的同學表示歉意，並希望他們相信黨和人民，以嶄新的心態面對新生活……」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副會長、總幹事王振稼回憶說：「光美學姐跟輔仁感情很深，我們有什麼要求她都盡力去做。她晚年身體不好，有人勸她別弄那麼多事情，她還是堅持去做。前年校友聚會，身體不好，在主席臺上坐著，也不能講話了。聚會的時候一般分系，十幾個系都在不同的地方，她還是一個一個地去看，跟大家見面談話。」

輔仁大學一年一度的返校節，王光美幾乎每年都參加。每次回到北京輔仁大學舊址，她從不與來京的外地校友去飯館，而是和在此讀書的學子們一起到食堂吃飯，重溫過去的那段美好時光。聽到當年的同學和比她小幾十歲的年輕學生叫她一聲「師姐」，她喜笑顏開，格外舒坦。



「文革」期間，曾在輔仁大學任教的幾位老師受王光美案的連累，也遭受了迫害。王光美對此一直耿耿於懷。一九八五年，在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恢復後的第一次校友聚會上，她一再向受到牽連的同學和老師表示歉意，並希望他們相信黨和人民，以嶄新的心態面對新生活。擔任校友會會長後，她一直為老校友、為老輔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也是想用自己一片誠心回報老輔仁對自己的教育之恩。北京輔仁大學停辦後，隨著校友們的老去，這所昔日的名校也越來越深地走入歷史的天空，為人們所淡忘。從上世紀中期開始，因為王光美的奔走號召，老輔仁的風光才被一再緬懷、追念。

